

斯顿，转达其“有尊严”的“下野”，以及“希望领事团斡旋”的愿望。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接到休斯敦的报告后断然予以拒绝，要求“美国驻广州的领事馆，既不可从中斡旋，也不应该提供良好的帮助”。不仅如此，舒尔曼还致电美国国务院，称“孙中山是中国重新统一的显著障碍”，“现在别无他法，只有清除孙中山”¹。

第四次，美国政府带头抵制、破坏广州政府收回“关余”的努力。在民国初期，中国海关的关税盈余继续由西方列强把持。在开展“护法运动”、成立广州军政府之后，孙中山一直希望西方列强能够将广州的关税盈余转交给广州政府而不是北洋政府。但是得到的回答依然是漠视和拒绝，欧美国家的甚至不惜派遣军舰进入广州港对孙中山进行武力恫吓，更令孙中山始料未及的是，美国“同来之战舰”竟然还“较多于别国”²。1924年12月，孙中山在其致美国国民书中，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华盛顿及林肯之国是否誓拒其对于自由之信仰，而转为力争自由国民之压制者乎？”³

残酷的政治现实，终于迫使孙中山从不切实际的幻想中清醒下来，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祸乱之源**不仅“在军阀”还在那些“援助军阀的帝国”⁴；“如果没有从外国政府那里取得的支援，北京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一天”；“如果不是因为有外国这个后台，人民将不费吹灰之力来推翻整个的军阀制度”⁵。不仅如此，孙中山更明确指出：“对于我们现时的大混乱和大崩溃，美国必须特别地承担责任”⁶。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孙中山的“国族主义”，会经历前后两个构建阶段，且不同的阶段对于“美国经验”或“美国模式”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于如何构建“国族”也有着完全迥异的理论设想。也就是说：对美国幻想的破灭，是孙中山在“国族主义”后期构建阶段中刻意回避，甚至有意消减“美国模式”对其“国族主义”影响的重要原因。

“戴季陶主义”的崛起与顾颉刚的宿命 ——“美国模式”与民国时期的民族政治（四）

熊芳亮

面对以伪造、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起家的蒋介石集团，顾颉刚的“救国”理想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呼吁，不可能影响、更遑论改变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治的既定轨迹。“国族-宗族”论的出炉，实际上标志着孙中山所设想的两种“国族”构建模式：无论是“美国化、政治化”的“国族”构建，还是“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构建，都伴随蒋介石集团的腐朽专制统治，一起沦亡。

¹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Schurman, FRUS, 1922, vol.I, pp.725。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第122-123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²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28-129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³ 孙中山：《国父全集》第二册，第128-129页。转引自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8页。

⁵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9页。

⁶ 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面对英美等西方的国家的抛弃、漠视甚至“嘲笑”¹，孙中山选择“以俄为师”，并与苏俄结成战略同盟。孙中山的目的，是通过与苏俄结盟，学习苏俄的军事和政党制度，同时获得苏俄的大量军事、经济援助²。但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是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

国民党“右派”虽然被称之为“派”，实际上并不是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它不能单纯以“阶级学说”进行划分，因为其中既包括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包括部分进步地主、开明士绅，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它也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或政治纲领，有的主张实行西方民主政治，有的主张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有的主张实行法西斯统治。但在“反共”、“反苏”、仇视“苏维埃”革命和“工农运动”方面，“右派”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国民党“右派”反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不断在国共两党之间制造政治摩擦，同时污蔑、攻击苏俄的外交政策，给孙中山和国共合作不断制造政治压力。其中代表人物，既包括邹鲁、胡汉三等国民党元老，也包括孙中山的核心幕僚之一：戴季陶。

戴季陶（1891—1949）长期跟随孙中山，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秘书，护法运动期间曾任广东大元帅府秘书长，逐步进入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戴季陶一度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交往甚密，并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最终因其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同时遭到孙中山反对而退出。作为国民党核心理论家的戴季陶，打着复兴儒家思想、民族文化的旗号，为“右派”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筹码³。

戴季陶自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一个建立在西方现代民权革命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通过强行将划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所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由现代世界的经济组织国家组织国际关系种种制度上面着眼，创制出的新理论”；一个是“能作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孙中山“关于道德的主张”，“是继承古代中国正统的伦理思想”的部分⁴，从而为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传统的孔孟哲学和仁义道德等同起来奠定了逻辑基础。在民生主义方面，戴季陶认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⁵，“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形式”，主张通过开展“政治的建设的工作”，“以国家的权力”实现“民生主义”，否定马克思主

¹ 1923年，孙中山曾向记者表示：“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但是）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西德]金德曼：《在中国历史经验照耀之下，孙逸仙的意识形态和其非凡的领导力》，《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1册）。转引自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² 国外学者许华茨(Benjamin I. Schwartz)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1951)，慧廷在《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1954)，布兰特在(Conrad Brandt)在《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1958)等著作中，已有比较充分的考证。[美]史扶邻(Harold I. Schiffrin)：《近五十年美国孙中山研究叙录》，曾学白译，《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3月。

国内学者也多持类似观点。例如，周宇清认为，孙中山与苏俄结盟，其目的是学习俄国革命党的“组织之方法”和俄国革命的“成功之方法”，虽然在“行动上联俄，革命方法、党的组织原则师法苏俄”，但是在“思想上仍保留着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认同”。王奇生的研究也表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并非“全盘俄化”，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方法。参见：周宇清：《孙中山“效法美国”与“以俄为师”之关系辨析》，《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³ 根据戴季陶的自述，其《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书的“腹稿”，“始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决定于总理病革旋居北平之时”（1925年）。戴季陶：《〈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重印自序》（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载于陈天赐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400页。

⁴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⁵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页。



义的阶级斗争学说¹。在民权主义方面，戴季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连带责任制”，反对主张自由权利的“个人主义”。在民族主义方面，戴季陶以为“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要有了民族的自信力，才能把全中国的人，组织起来，努力于革命事业”²，主张先恢复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和伦理道德，然后才能恢复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地位。

戴季陶宣称，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就是复兴中国儒家文化，而中国在历史和现实之中之所以饱受列强和专制压迫之苦，正是因为失去文化自信力、创造力的结果。恢复儒家文化，既能为革命提供了道德基础——“革命的意义，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革命的动机，是由于一种利他的道德心”，而儒家的“仁爱”正是“革命道德的基础”；又能为三民主义提供了革命的力量源泉——就民族主义而言复兴儒家思想可以恢复民族精神，扶弱济困，化解西方民族竞争之性，最终实现大同世界；就民权主义而言，复兴儒家思想中“仁爱”道德和“知难行易”，为“阶级联合”进行“国民革命”和“统一革命”，实现“人民权利”提供了道德依据和哲学基础。

戴季陶认为，“民族是以文化为基础，是在同一的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上面构成的”³，“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⁴，这种以“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民族即国族”。戴季陶清楚地知道“在中国现在疆域内是不止一族的”，其中最显著是蒙古和西藏⁵，但仍然主张以基于文化、血缘意义上的“民族”来确定“国家的界限”，宣称除非做到文化上面的“一致结合”，“中国民族”的概念不适用于蒙古、西藏⁶，提出要“承认蒙古独立”，“尊重西藏的独立，尊重西藏的自由”⁷，完全置孙中山构建“国族主义”的初衷——团结四万万人民共同奋斗——所不顾。戴季陶这种“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主义”和“国家观”，最终演变为赤裸裸的“放任主义”、“分裂主义”。

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时代环境之下，鼓吹复兴儒家文化对于国民党右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第一，经历一战之后，西方文化没落论喧嚣尘上，恢复国粹、弘扬国学、复兴儒家成为一时的社会风潮，提倡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获得部分知识分子和传统士绅的认可和青睐。第二，海外华人华侨、会党秘密组织一直是国民党开展革命运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对这部分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提倡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赢得国民党基础力量的支持。第三，提倡复兴儒家文化传统可以激发社会上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利于“右派”鼓动、策划“反俄”运动。

国民党右派反对、攻击“三大政策”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孙中山的控制和压制，但是苏俄、共产国际希望在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掌握、控制国民党的举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孙中山的不满和警惕。有土耳其领导人凯末尔在革命胜利后与苏俄反目成仇的前车之鉴，苏俄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在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国民党⁸。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国民党的决议》，其目的就是重新定义、阐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在该决议的基础之上起草的⁹。同时，国民党一大制定的《中

¹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7—408页。

²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六月）。转引自高军、李慎兆等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3页。

³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8—139页。

⁴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页。

⁵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7—138页。

⁶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38—139页。

⁷ 戴季陶：《三民主义的国家观》。《戴季陶讲演集》，上海新生书局，1928年版，第143—144页。

⁸ 用鲍罗廷的话说，在被土耳其的热咖啡烫过一次之后，俄共（布）在国际援助方面连一杯凉水都要用嘴吹一吹。

⁹ 参见熊芳亮：《蒋介石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时期的民族政治》（一～三），中国民族报，2012年12月14日、12月21日，2013年1月4日。



国国民党党章》，也是以 1919 年 12 月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所颁发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为蓝本，“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雷同”¹。孙中山虽然未能阻止鲍罗廷就发表《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但是他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一是在国民党一大结束不久就再次公开、系统性地演讲《三民主义》；二是在回答学生关于“国民党是否实行俄国的主义”的提问时，明确表示“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²；三是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任部长正是戴季陶）正式对外澄清：“国民党改组”只是“改组党之组织，采用俄国委员制”，同时强调“国民党之本体不变，主义不变，政纲之原则不变”的“三不”原则³。从上可以明显看出，孙中山强烈希望捍卫“三民主义”的独立性及其对于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政治上“靠不住”，苏俄在理论上“不可靠”，这就给了所谓的国民党“右派”以可乘之机。在与列强交恶、对美国绝望、与苏俄即合作又斗争的情况之下，所谓的“右派”成为孙中山在政治上、理论上都需依靠的一支力量。戴季陶在国民党一大不仅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而且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成立后，孙中山一度任命戴季陶担任政治部主任。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北上与北洋军阀谈判，戴季陶也是陪同人员之一。从选择戴季陶担当掌管国民党意识形态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要职来看，孙中山对戴季陶在政治上十分信任和倚重。孙中山去世后，戴季陶撰写了《孙文主义哲学的基础》及《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形成了一套反共理论体系，得到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广泛认同，史称“戴季陶主义”。“戴季陶主义”迎合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反共、反苏立场，不仅实现了中国国民党右派的组织联合，为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并且成为蒋介石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此期间，戴季陶不仅俨然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代言人自居，而且在其论著中经常有大量的内容和观点与孙中山雷同甚至几乎完全相同，但戴季陶从未说明是否在引述孙中山的著作。这一方面是戴季陶的有意为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戴季陶对于孙中山后期的思想和言论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力。在“国族主义”后期构建阶段，孙中山突然改以儒家政治中的“王道”阐释“国族主义”，企图依靠所谓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旧组织”来实现“国族团结”，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正是国民党右派，尤其是戴季陶的理论和思想对其的干预和影响。毋庸置疑，这种干预和影响为戴季陶日后伪篡、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炮制“纯正的三民主义”；为蒋介石编造所谓“从家族到宗族，由宗族到国族”的所谓“遗训”，炮制“国族-宗族”论，都提供了相当的政治便利和理论条件。

相比而言，大胆直言批评戴季陶边疆民族政策的顾颉刚，无论是在政治地位、政治能量上，还是在对蒋介石集团政治决策的影响上，都显得太微不足道了。在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时期，戴季陶虽然只是长期担任考试院院长一职，但实际上把持着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最终决策权，控制着边疆（民族）政策的政治走向，被时人称之为蒙藏委员会的“太上委员长”。用形象的比喻来说，这是一场蚂蚁挑战大象的战争。纵然戴季陶的边疆民族政策伪篡、歪曲了孙中山“国族主义”的本意，纵然顾颉刚戳破了戴季陶所谓“继承道统”的政治神话和“同祖同源”的政治谎言，纵然顾颉刚实际上继承、充实了孙中山先生的“国族主义”的精髓，纵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在学界、政界和舆论上都引起了广泛响应，两人在学识上的高下已分，在政治上的胜负却也不言自明。1942 年，蒋介石炮制“国族-宗族”论，虽然表面上顺应了学界和舆论要

¹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4 页。

² 徐永瑛：《见孙中山先生记》，《清华周刊》，1924 年 4 月 4 日。载于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 305 页。

³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14 期（1924 年 3 月 30 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2 页。



求捍卫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诉求和呼声，骨子里却仍然延续着戴季陶“以文化定义民族（国族），以民族定义国家”的基本逻辑，其构建的“国族”也是“文化化、传统化”的“国族”。换言之，主张构建“政治化”“国族”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影响蒋介石集团边疆民族政策的走向和决策。

这也就决定了顾颉刚在与国民党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不得不感慨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是鬼界，不是人世”，“是兵国，绝非民国”，对“救国”理想逐渐心灰意冷，最终宁愿脱党从商，也不再愿意参与国民党的党政。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才能肩负起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的历史重任。

【网络文章】

中国史叙事之争与国家认同的困境

2014年08月12日 15:11 新浪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 傅正

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这段独白业已成为经典论述在各种史学论著和大中学校历史读本中不断被复述转引，成为大众群体感受中国近现代民族危机并激发爱国热情的必用材料。然而，只要我们稍加留意就不免于发现，梁启超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他所谓的传统史学“只有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等于是说近代以前没有“中国史”，甚至于没有“中国”。“中国史”与“中华民族”一道不过就是在近代才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梁启超不会想到，他曾不遗余力打造的“中国史”在一百年后却走到了自己初衷的反面。这一呼唤爱国主义的努力在今天的台湾学界却变成了民族虚无的证据。问题集中表现在“中国史叙事”的合法性上。诸如杜正胜先生及其新史学作者群便以此为理由，鼓吹以台湾史代替中国史，使其处于“同心圆”的中心。顺着这条逻辑推演下去的结果是我们不堪承受的，不啻台湾史可以脱离于中国史，元史、清史也可以脱离于中国史，甚至于连中国史都可以取消。

对此，我们不禁追问，“中国史”究竟从何而来？与中国史休戚相关的国家认同只是当下的新问题吗？

一、流行理论引发的问题

一般认为，民族理论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实在论和建构论。而自1969年巴斯主编的论文集《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出版以来，当代族群研究者大都扬弃了以血缘、肤色、发色等体质特征，以及语言、服饰、发式、宗教、风俗等文化特征，来区分族群的传统论述形式，转而从族群成员的“主观认同”来界定族群。这可以说是建构论对实在论的一次重大胜利。我们不应对此感到奇怪，建构论的兴起无疑是对纳粹种族主义的反思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反映。在甚嚣尘上的建构主义浪潮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题

